

彻底肃清典妻陋俗

——闽浙山区典妻婚比较研究

叶大兵 叶丽娅

典妻婚是由封建买卖婚姻派生出来的一种临时性婚姻形式，它在中国大地上流行了将近一千多年，是中国婚姻史上黑暗、悲惨的一页，对中国妇女所造成的痛苦和灾难是无可补偿的。建国后，《婚姻法》规定：禁止典（雇）妻，禁止买卖婚姻。此俗曾基本消迹，并逐渐被人遗忘。但是，随着历史长河的迂回，封建残余思想如同幽灵夜出，沉渣泛起，在一些穷乡僻壤，典（租）妻陋俗又死灰复燃。它残害妇女身心，毒化社会风气，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严重障碍。闽浙山区曾是我国历史上典妻婚的流行地区，本文就此问题进行调查和某些探索。

（一）对闽浙山区典妻婚的考察

据史载，福建寿宁一带，在明代已有此俗。那里的贫苦百姓，如遇到急需，出于无奈，就典卖其妻，民间不以为讳。有些人把自己妻子租与他人作为妻，为其生子。当时的价格是“岁仅一金，三周（年）而满”，典妻期满，旧夫前去迎归，也有变典为卖，写了卖券的^①。

到清代直至民国，这种陋俗仍在福建流行。在福安县，有把妻子典借给别人，叫“穰妻”，俗称“租妻”。期限通常是三到五年，期间所生的孩子都归后夫，如果妻子因病死亡，前夫和后夫

会同心协力共同料理后事，租期限满，前夫必须用原价赎回妻子。^②在福建古田、屏南等县，常有贫苦人家妇女，经丈夫同意，通过媒人，招一后夫进门，时间约定，十年的称“挂帐”，二、三年的叫“帮腿”。期间所得典金全归前夫收用，所生孩子，有时亦可两两均分。前、后夫之间称为“交夹兄弟”，与福建风俗相同的台湾省，直到抗日战争时期，仍普遍地存在典妻习惯，中等以下的人家，有的男子把自己的妻典给人家，以苟活自己的生命。^③

在浙江，早在宋代的临安已有此俗。在宋《京本通俗小说》“错斩崔宁”一节中，具体反映了当时的典妻陋俗。故事说的是宋高宗时，临安城里有位叫刘贵的官人，因经商不佳，输光了本钱。这天得到丈人赞助的十五贯钱，酒后回家，对其妾陈二姐开了个玩笑，说“……只是我一时无奈，无计可施，只得把你典与一客人。又因舍不得你，只典得十五贯钱，……”还说已请人“写了文书”。陈二姐听后信以为真，于是深夜出走，路遇一连串巧合事件，最后被人杀死。而这一悲剧的直接起因，就是一番“典妻”戏言引起。遗憾的是清人朱素臣的《双熊梦》和建国后演出的昆曲《十五贯》，都把“典得十五贯钱”改为“卖妻所得”。因而，其典妻之事后人都不晓。以上说明，当时在典妻时双方必须写文书，有典有赎，赎回典妻时不仅要归还典价，还须加上利息，原夫如想早日赎回其妻或担心期满无力赎回妻子，可降低典价等。到元代典妻之风仍盛，故《元典章》载：“吴越之风，典妻雇子成俗久矣，前代未尝禁止。”

明清到民国时期，浙江的典妻陋俗十分流行。清人徐珂在《清稗类钞》中说：“浙江宁、绍、台各属，常有典妻之风。”又据1985年《重修浙江通志稿》载：清末，在浙江一些地区，“男子妻亡，无力续娶，或妻久不育，常在外地别谋一妻，

订立契约，限以岁月日期，久者称‘典妻’，暂者称‘租妻’，期到各离。所生子女则归男子，其被租典之妇，大抵为孀，亦有因家贫夫存，而出典、出租者。”民国十九年（1930年）前后，当时在奉化地区，一些人家的妇女，丈夫亡后，遗有子女，家无恒产，难以度日，无奈将已身典与他人为妻，以获得钱、粮养活子女，维持生活。在松阳，因丈夫贫病交加，妻子征得前夫同意，把典夫招到家中同住，收取典金供前夫养病费用，俗称“招夫养夫”。在宁波，“贫苦之家蓄妻不得温饱，可以租之于人，共订合同，半载或一年、三年，以本夫之需索，以定期之长短，期满则退回而已。”在绍兴城乡，特别是山区，均有典、租妻陋俗。^④

从全国来看，此俗始于宋。在我国史籍上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北宋的《续资治通鉴长篇》，“比因饥馑，民有雇鬻妻子”；“质妻卖女，父子不保”等。南宋洪迈的《夷坚志》也有记载：“典质妻子，衣不蔽体，每日求乞得百钱，仅能菜粥度日。”元明时已普遍流行，如元朝，南方典雇妻女之风盛起。浙东海右道副使王朝给中书省的请牒中载：“其妻既入典雇之家，公然得为夫妇，或为婢妾，往往又有所出，三年五年限期满之日，虽曰归还本主，或典主贪爱妇之姿色，再舍银财”。到清代和民国时流行面更广，不仅南方有，北方也有（如在辽宁，叫“搭伙”）。那些妇女一般因丈夫多年外出不归，生活困难，无法自立，就出典自己。与另一个男人成立“搭伙”关系，签署字据。若原夫回家将钱还清，就可以领回妻子。^⑤在甘肃叫“佃妻”（即租妻）。清人赵翼在《簪曝杂记》中载：甘肃多男少女，有的男子（或因贫穷）娶不到妻子，但希望有个儿子延续香火，于是就去租赁他人之妻，立券书期限或二年、或三年，以得子为限，过期则原夫领回，不能再留一日。

纵观历代的法律，元朝是第一个把“禁止典妻”列入刑法的。

《元史·刑法志·户婚》曰：“诸以女子典雇于人及典雇人之子女者并禁止之，若已典雇愿以婚姻之礼为妻妾者听，诸受钱典雇妻妾者禁，其夫妇同雇而不相离者听。”当然，封建统治者主张“禁止典雇妻女”，并非尊重妇女人格，而是为了巩固其封建王朝统治的需要。在《明律·户律·婚姻》中对此俗都设了禁条：“凡将妻妾受财，典雇与人为妻妾者杖八十，典雇女者，杖六十，妇女不坐，……知而典娶者，各与同罪，并离异，财礼入官，不知者不坐，追还财礼。”清律仍袭明律之旧本。清光绪三十四年（公元1908年）修定刑律时，把“杖”改为“罚”。十杖为一等罚，二十杖为二等罚，以此类推。《清律辑注》：“必立契受财，典雇与人妻妾者，方坐此律。”民国成立后，孙文大总统颁布的现行律，也有“禁止典雇妻女”条。从元至明、清，刑法从一般的“禁止典雇”，发展到对出典人和受典人实行杖罚，并没收财礼，足见当时典妻之风各地有增无减，逼使统治者采取严厉措施。但由于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，一直难以奏效，到建国前夕仍然存在。

建国后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，典妻在闽浙两省绝大部分地区已经消除，但在少数偏僻山区仍不时出现，如七十年代末，浙江省宁海县凤潭大队仇某某，以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为借口，威逼做了绝育手术的妻子叶某上邻近公社一寡妇家说“媒”，与寡妇同居育子。仇家还为此举办酒宴，不少村干部和他的亲朋好友都来贺喜赴宴。其妻满腹屈辱，无力挣脱这世俗的封建陋习之网，曾以死相抗。仇某无视法律，公开与人同居，犯了重婚罪，终于被依法判刑，锒铛入狱^①。1982年，浙江省临海市黄坦乡某村，某某因生活困难，私下将生了四个孩子的妻子典给同村的某某五年。并骗她说是“离婚”，在典契上捺了手印^②。这不禁使人

想起三十年代进步作家的优秀短篇小说《为奴隶的母亲》。作者就是以故乡宁海农村相当普遍的典妻制度为题材，用深沉的笔触，写出了“典妻”给农村下层劳动妇女带来的悲剧命运，深刻揭露了野蛮残酷的封建陋习。然而在半个世纪后的七十年代，在柔石的故乡宁海县，典（租）妻陋俗所造成的悲剧尚未结束。

近几年来，在浙江的平阳、永嘉和福建的龙岩等地，亦时有发生。1987年，笔者多次深入浙江南部山区的平阳、永嘉等地调查，如平阳县的“石城村”，七年前，该村有位妇女，因家庭生活困难，被其丈夫以600元典价，给入典租十年。另一个由于土地关系而自发组成的典妻家庭，条件是：有田出田、有妻出妻，生儿育女，共同生活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该村多数男女群众中，大都对此陋习，熟视无睹，不以为然，还引为笑谈，其思想上的麻木程度令人十分惊讶。

（二）谈两省典妻婚的共同特征及其性质

闽浙地区的典妻婚，具有明显的买卖性质，是一种有效的临时性婚姻形式，其共同特征为：

第一，典妻仍然保持和前夫的夫妻关系。典妻时，首先必须在契约上写明起讫年限，并规定典期内禁止前夫和典妻发生性关系。典妻这种婚姻关系，说明典夫和典妻之间是非正式配偶，是一种属于在一定期限内的“临时夫妻”关系。典妻和原夫仍保持名义上的夫妻关系，在典（租）期内，只是原夫妻关系暂时中断一个时期。期满契约作废，妻子仍回原夫家恢复婚姻关系。这一特征是典妻与其它婚姻形式的最大区别。

第二，“留子不留娘”，妇女成为一部纯粹的生育机器。典子可入宗谱，而生母作为典妻，大多不能“上事宗庙，下继宗谱”。妇女在被典期内生了男孩后，就可回归原夫家，故俗称“租肚皮”。

第三，以人为物，论价典押，是赤裸裸的卖身行为，典（租）妻具有以人抵押，暂时出卖的特征。出典男子接受对方一定数量的实物、货币作为典金，将妇女作为纯粹的活商品，典押给人家使用。典妻婚就是这样通过买卖交换关系，达到“婚姻”的目的。

长期以来，闽浙两省的典妻婚在民间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约定俗成的惯例，如典妻须订立契约，亦称“典婚书”、“合同”，各地所写契约没有一定格式，但都要以双方署名签字为有效。一式两份，由原夫和典夫收执。一般除阐明出典原因外，还写有期限、典价、子女抚养、归属等具体条款。典、租妻都需有媒证，有称“中人”或“介绍人”。典妻婚虽是一段临时婚姻，许多地方民间仍按明媒正娶的一些习惯行事，形成典妻迎娶风俗。旧时，大部分地区在夜间抬便轿迎娶，并以薄酒谢媒，宴请长老、乡亲，热闹的还举行典婚仪式和洞房花烛的俗礼，不过不挂灯结彩就是了。典妻所生子女归属典夫，典子获可得继承财产权，并可列入宗谱。

总之，典妻婚是从封建买卖婚姻演变而来，是从买卖婚中派生出来的一种畸形的临时婚姻形式。它把妇女作为纯粹的生育工具，论价典租出卖，使妇女身心遭受巨大痛苦，属于野蛮落后的婚姻陋俗。

（三）论典妻婚的产生根源及其治理措施：

典妻婚所以能成俗，自有它多方面的社会历史原因，诸如政治的、经济的、心理的、地域的等等。主要有以下几点：

第一，妇女地位的低下，是造成典妻婚的社会根源。由于父权制的建立，妇女逐步在社会和家庭中跌落到被男子支配的地位上，特别是宋代以来，理学的形成和发展，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摧残日益加深。妇女没有政治地位和经济权力，只是依附在丈夫这

张“皮”上，随其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“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”，夫穷则妻卑，穷汉的妻子命运更惨，典妻正是一个穷汉无力养活老婆，让其依靠另一个男子的经济力量继续生存的反映。据解放前夕浙江的资料，一个女子典五至十年，仅京谷1300斤。建国四十年以来，农村广大妇女提高了思想觉悟，但在某些偏僻山区中，妇女地位虽有改变，但思想上至今仍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，生活在充满封建迷信、愚昧落后、经济贫困的环境中。特别是那些被出典妇女，她们既无文化知识的传授，又无进步思想的影响，不知什么是女权、人权，更无法理解什么叫维护自身的独立人格，仍是旧时“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”的思想。在落后民俗意识的支配下，对自己所遭受的痛苦，只是一味地忍受和埋怨命苦，缺少自身的反抗精神，因此，使典妻悲剧不断发生。

第二，传宗接代的观念，是造成典妻婚的思想温床。封建宗法制规定，不论是宗族的延续，还是财产的继承，都必须有合法的继承人，即必须有儿子。它要求男子担负起传宗接代，荣宗耀祖的使命。因此，无后是对祖先的最大不孝。正是在这种封建道德观的毒化下，为变态的典妻婚作了舆论准备。于是，在“传宗接代”的大旗下，在社会中下层中就出现了一种一夫一妻制以外的“合法”补充形式，诞生了典妻这一买卖婚姻的畸形儿。建国四十年来，我国的社会制度虽发生了根本变化，但几千年来的男尊女卑和传宗接代观念，在当今社会仍顽固地支配着人们的行动。当一个新生命诞生时，有人为生男子而自豪，也有人为生女孩而自卑。这种生儿子才能延续祖宗香火的思想，归根结底就是封建的男尊女卑观念。

第三，山村贫困落后，是滋生典妻婚的自然土壤。据大量史料反映，典妻多数发落在经济、文化落后，交通、信息闭塞的穷乡僻壤。原始的生产工具、贫瘠的土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。

那里的村民大多贫穷，一旦经济拮据，生活出现困境，就会陷入告贷无门，难以生存的境地，无奈之下只得将属于自己私有财产——老婆，拿出典押质钱。如平阳县石城村属二类贫困乡，尚依靠政府救济。村民们常年吃番薯丝充饥，稻米留给老人、病人、产妇吃。乡亲们说，没有共产党来生活还要苦。据初步了解，目前由典妻组合的十多户家庭中，一般都是穷丈夫养不起老婆无奈将其出典于人。受典的男子大多为生活困难，无力娶亲，于是去“典妻”，为自己生子传代。在这些穷山沟里，人们世代沿袭传承的典妻习惯行事不以为怪。我们还发现这些地区往往还伴随着多种封建陋习，如溺女、抢亲、童养媳、姑换嫂、早婚、等郎媳等等，无可置疑，贫困落后是产生典妻陋俗的物质原因。

我国目前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变革时期，在意识领域中的旧风俗和新风尚的斗争表现得十分尖锐。那些过时的旧风俗、旧习惯的灭亡过程，并不是那么简单顺利的。人们思想在趋新的同时，往往有恋旧的一面。但是，历史遗留的典妻陋俗，曾是中国妇女的巨大耻辱和苦难。在建国后的今天，我们决不能让这封建陋习重演。我们要采取措施彻底肃清这种陋俗。

由于典妻婚是经济贫困、文化愚昧、思想落后的混合产物，因此，也必须采取综合治理办法，才能奏效。一是努力发展山区经济，彻底摆脱贫困落后现象，使这些山区人们逐步富裕起来，不再因受到饥饿、死亡的威胁而典妻。二是彻底批判男尊女卑的观念，进一步树立男女平等思想，使人们从灵魂深处清除封建流毒。三是向干部、群众大力进行普法教育。上述叶某等人被典，竟是村干部从中热心“撮合”。在强调健全法制的今天，这种公然违反《婚姻法》的行为是不能容忍的。四是积极提高农村（特别是偏僻山区）妇女的思想觉悟和文化修养，这是杜绝典妻婚的根本措施。中国农村的广大妇女是受封建压迫最深的一部分。五

四以来的妇女解放运动，虽然唤醒了中国广大妇女，但未能很好深入到农村阵地上，因此，只有不断提高她们的文化、思想素质，唤醒沉睡的自我意识，才能使她们敢于冲破旧俗的罗网，积极去追求妇女应有的人格、权利和尊严。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春风，吹进这些被人遗忘的角落，乃是我们今天刻不容缓的任务。

①明·冯梦龙《寿宁待志》。

②③何定华：《满腔悲愤话典妻》（《风俗》杂志1985年第二期）。

④1930年《浙江民商事习惯调查会报告》。

⑤何定华《满腔悲愤话典妻》（《风俗》杂志1985年第二期）。

⑥《浙江青年》1983年第8期。

⑦《中国妇女报》1988年9月26日。